

■本报特别关注·上海论坛

几年前,亚洲经济飞速发展,全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很多人由此断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近两年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亚洲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人们开始担心: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一个冲突撕裂的亚洲,还是一个和谐共生的亚洲?日前,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共同举办“上海论坛”,大会的主题聚焦于“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



亚洲的问题必须靠亚洲人民自己解决

□本报记者 汪仲启

今天的亚洲,一面生机勃勃,另一面阴云密布。她的多样性蓬勃生长,老牌大国和新兴国家都跃跃欲试,众多强大的力量在或明或暗地角力。20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局面,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霸权,新兴力量和老牌大国之间,不得不通过战争重塑秩序。布热津斯基甚至担心,复兴的亚洲会不会滑向民族主义狂热,引发类似20世纪欧洲那样的冲突。

亚洲面临关键转折期

亚洲长期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这个存在多样文明的古老大陆用了将近三代人的时间,才修复创伤,从战争和贫困的废墟中缓慢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真正有影响力的角色。到今天,亚洲已然成为这个星球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的GDP占世界GDP总值的29%,并且预计到2020年将增长到39%,2040年将达到51%。其中,中国的GDP将会在2040年占世界GDP的23%,印度占16%。技术创新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这里上演,中日韩三国都已经跻身世界五大技术创新国之列。然而,亚洲的政治关系并不令人感到鼓舞。

亚洲是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最为复杂的大洲,也是一个缺乏综合性安全机制的大洲。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领土争端、历史恩怨、环境问题、跨国犯罪……无不在侵蚀着这个大陆复兴的基础。波士顿学院政治系国际关系学教授 Robert Ross 说,我们不能够从欧洲的历史去推断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过渡的现象。妄图通过战争去促进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是愚蠢的,东亚完全可以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转移必然是和平的。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军社却认为,亚太地区安全面临的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正如韩国前总理韩升洙所说,亚洲地区如果无法实现长期和平,那么未来该地区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将不可实现。实现东北亚地区的持续、持久的和平,要建立在互信、互谅的基础之上,抚平战争和历史的伤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和妥协。中国、日本、韩国之间需要能够达成一致意见,这将是该地区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基础。Robert Ross 说,中国目

前主要进行两件事:其一,在国际事务上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和力量;其二,不断改善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对于亚洲而言,现在是一个非常时刻,这个时刻充满着转型和不确定性,不仅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面临转型,亚洲的权力版图也在重塑。一方面,亚洲的经济发展非常繁荣,而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又非常明显。除此之外,全球力量的转换也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焦虑情绪。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表示,这有可能带出一个“新的冷战”。但是,和上个世纪的冷战不同,中国和美国之间都有意愿采取新的措施,解决这个挑战。中国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即“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的一次尝试,以便能够重新定义中美之间的关系,“恐怕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说,一方面,亚洲肩负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与往来,将为全球经济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以及地区的深化合作创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任务和挑战,亚洲只有将转型与创新作为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才有可能在未来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从而实现亚洲的追赶与超越。“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上海论坛以‘亚洲转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恰逢其时。”

亚洲需要新安全观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赵华胜教授说,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很多争端与冲突,缺乏信任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最大原因,“有必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防止冲突发生、升级的磋商和沟通机制”。

要论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欧洲或许可以和亚洲相提并论。但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Andrey Kortunov 表示,冷战后欧洲也出现了很多武装冲突或战争,因此东亚安全的实现不能简单模仿欧洲的安全机制。东亚安全合作要使各国防务更加透明和可预测,并加强在军事方面的互动。东亚的发展议程和安全议程的互动不能分离,没有了政治安全机制的保障,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牢靠。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石源华教授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但不是核心利益,因此可以在承认并搁置争端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

随着亚洲国家GDP比例的变化,中国正由地区适应者向调整者过渡,并支撑着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成为地区安全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赵江林表示,在亚太地区,中国要主动推进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的解决,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并主动融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规则。但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周边乱局实为RCEP和TPP之争的结果,亚太地区并非缺少制度,而是过度制度化,制度和解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挑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Vinod K. Aggarwal 认为,RCEP和TPP在很多国家眼里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RCEP和TPP是亚太地区融合的关键因素”。

世界和亚洲正在实现权力转移。这个过程是否和平,考验着人类智慧,因为这样的和平转移似乎并无先例。因此,也可以说,亚洲需要新的安全观。传统安全观的特点是结盟、对抗、零和博弈,这样的游戏仍在上演。而新安全观必将是一个突破,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新安全观所面临的挑战要复杂得多,它被有些认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此新安全观必须凭借合作性的机制建设,要有实质内容。

今年3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习近平说:“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作为代表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责任就亚洲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

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方向提出看法,中国也必须为亚洲安全与和平发展承担责任。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中国的崛起

无论是泛亚太的战略框架中,还是实际的影响力上,美国都是亚洲事务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潜在的操盘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达巍先生认为,中国有可能在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超过美国,但由于内部大量问题的存在,中国不会也不愿意挑战美国的霸权。东海和南海问题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失控点,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但是安全问题可能导致双方发生冷战。

因此,在目前这样一个爆炸性的环境下,战略家们提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的参与,是亚洲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hristopher K. Johnson 说,在亚太地区,中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这就需要与跟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 Hugh White 教授认为,目前,美国在亚洲主要的战略观点或者目的就是基于美国的领导地位保持亚洲的现状。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过去几年一直试图通过不同的争端以测试美国的意愿,测试美国是否真正愿意保持现状。美国未来需要做的是,在拉拢盟友的同时避免使得中国紧张,以发挥维护东亚和平发展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

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不断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建所谓的“C型包围圈”,更是在当前的一些领土和国际争端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国带来地区威胁。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明确地表示,美国必须承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中国的崛起。

中美两国要协调彼此在亚太的利益,都要做一些不牺牲本国核心利益的让步而避免冲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教授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主要是在安全方面维持其领导地位和在经济方面确保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既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其利益又不会受到崛起的中国的挑战。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而美国则是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二者目标并不冲突。美国应该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冲突、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与中国保持一致,从而约束日本,使日本不会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障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都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太平洋足够广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正如论坛《亚洲共识》总结的,科技创新是亚洲转型的不竭动力;开放变革是亚洲转型的思想旗帜;和平合作是亚洲转型的坚实保障;绿色环保是亚洲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的亚洲,是一个发展的亚洲,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亚洲。但亚洲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亚洲人民自己手中。争端得到解决,发展就可持续。亚洲需要考虑的是,在获得包容性发展的同时,避免滑入对抗和战争的深渊。

■关注

亟需加强涉藏涉疆智库建设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新疆平台副主任 周伟

境外“藏独”、“疆独”活动及其支持势力的理论支持源于西方国家大学等涉藏涉疆智库群。我国现有涉藏涉疆智库附属于党政机关,工作有一定的限制性,既影响中央、自治区涉藏涉疆科学决策及其中央各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也阻碍我国民间在涉藏涉疆国际舆论中发出中国声音。

家治藏治疆战略安全需要相适应的体系完整、预测研判能力强、政策转化效率高的研究队伍,更没有形成能与西方涉藏涉疆智库研究进行智力较量的本土战略研究体系,极大影响了涉藏涉疆政策的制定、实施、调整与发展。

加强涉藏涉疆智库建设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性涉藏涉疆智库,为中央涉藏涉疆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在目前行政管理制度下,中央、地方主管部门负责人通常5-10年更替,难以积累长期性、连贯性的研究基础。建议采取特别措施,参照国际上智库发展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涉藏涉疆智库群。一是在教育部正在实施的211协同创新计划中优先安排1-2个专业智库,二是建立涉藏涉疆专业研究智库队伍,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对国家涉藏涉疆重大决策的制定进行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进行论证,对重大政策的实施开展实际效果的评估。该智库平台的条件是:在行政管理、财政上与中央部门、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行政隶属关系;有开展博士培养、科学研究、理论构建、政策建议的能力;与中央部委(军队、安全)、自治区、党政智库、实际工作部门人员共同协同研究;具备与境外相关智库开展学术交流、专业论证、信息分析、智力较量的能力。

第二,建立基金会,创新涉藏涉疆智库工作机制。涉藏涉疆智库的目标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政机关不可能采取经济类等智库通过市场化或者民间方式运作,也不能回到财政供养受制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状态。建议统筹考虑成立中国藏文化基金会、中国维吾尔文化基金会、中国哈萨克文化基金会等,建立起中央财政注入为主,同时吸纳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等捐赠的方式,保障

涉藏涉疆智库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专业智库通过为中央主管部门、自治区党委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咨询服务等方式,承担委托项目、政府购买咨询服务等,拓展政策战略发展研究的广度、深度,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第三,采取特殊措施培养涉藏涉疆专业智库人才。2020年左右,现有极少数涉藏涉疆政策研究人员基本上退休。不仅国际藏学研究领域话语权长期被西方学者控制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而且国际维吾尔学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也将逐步趋于固定。涉藏涉疆专业智库人才的成长,从硕士培养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周期,教育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治藏、治疆、治边的战略部署,引导高校培养一批母语是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经济、法律、政治学、社会学等智库博士生、硕士生;党政部门要从战略发展高度培养一批具有智库人才背景等素质的人进入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地方后备干部储备库等。

第四,改进涉藏涉疆智库成果转化方式。实践中,非党政机关涉藏涉疆智库研究成果,只有经中央智库渠道、中央主管部门、自治区党委部门审核通过后才可报送中央有关部门、自治区主要领导。审核人员的主观判断及其判断能力的差别,事实上都极大影响成果是否被报送。建议根据智库研究成果保密与非保密情况,完善涉藏涉疆重大成果、常规成果、应急成果的审核、上报渠道。要健全对非保密智库研究成果社会传播、媒体影响、国际交流等评价指标,扩展智库研究成果的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特别要发挥涉藏涉疆智库主动参与国际舆论交流的作用,采取学术方法开展涉藏涉疆外宣工作。

本版责编 徐峻音
E-mail:skb.skb@163.com

■图片新闻

6月16日上午,由上海社科院、上海钱穆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族伦理美德——钱氏家族文化的现代意义”高峰论坛,在长城大厦举行。同时举行的还有甲午仲夏台湾钱复拜谒钱王训示碑并敬献花篮仪式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钱汉东考古文化研究所揭牌活动。

本报记者 程洁/文
潘圳 慕晓芹/摄

